

日前，启德教育集团在京发布了2014英国留学申请大数据报告（下称报告）。数据显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国顶尖大学申请相比以往难度加大。该报告以该集团去年9月至今年4月英国留学申请期间的近万例数据为基础。



图片来源：《山西晚报》

2014英国留学申请数据发布

英名校申请门槛走高

杭 榑

想进名校不容易

数据：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申请成功率分别为2.00%、5.00%。

专家点评：院校申请难度大的主要原因是，申请人数众多，而学校的录取要求又极其严格。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具有优秀的学术背景和学习成绩，如211/985院校、平均分85以上、雅思7.0以上（单项不低于6.5），商科学生GMAT要求710分以上；还要审核学生的相关背景，如论文发表、名企实习、知名竞赛获奖、研究项目、海外名校交流经历、知名教授或业界名人推荐信、艺术特长等。这些学校的申请、审理流程也比较复杂耗时，如准备面试、论文、视频等，都要求学生投入大量的精力，稍有疏忽就可能前功尽弃。

除了以上3所院校，英国其它大学的录取要求也很严格。首先，很多英国大学对转专业学生的审核非常细致，这就导致在国内学习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很难申请到英国的金融等专业。其次，学生在国内院校的排名、语言成绩、在校成绩、申请材料递交过晚（学校生源已满）、没有通过面试或附加测试，都会增加学生进入心仪大学的难度。

名校学费昂贵

数据：通常情况下，英国大学的平均学费约为1.3万至1.5万英镑/年，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英国顶级大学的学费非常高。这些学校的商科专业学费高约2.5万至3万英镑/年，工科和其它社科类专业的学费相对低些，也需约2.2万英镑/年。

专家点评：顶级大学学费高主要是由于学校为保持其在国

留学素描

董嘉霖：

打造国际化的朋友圈

王 婷

2011年，大连男孩董嘉霖到美国加州拉文大学MBA学院就读，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并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在他看来，多交当地朋友，除了可以提高英语水平之外，也可以有多重收获。

SIFE大赛中获肯定

研究生一年级下半学期，董嘉霖在一位已经成为拉文大学SIFE大赛（国际大学生创业大赛）校队队员的美国朋友介绍下，有幸进入了校队的教授。教授向董嘉霖对中美经济的看法等问题后，同意他加入校队。

SIFE大赛是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实践项目比赛。在美国，大赛程序是，先是美国各州内的学校间比赛，每个州再选出10支代表队参加全美的比赛。

2012年3月，SIFE大赛加州院校间的较量中，拉文大学最终进入前10名。大赛组委会安排参赛选手与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一起进餐。进餐时，每桌有两位不同企业的高管，同校的选手不能同桌，每桌12人。这意味着一个学生要面对11张陌生的面孔，一个学生和其他学校的9个学生竞争，谁能在就餐时用恰当的方法向高管展现自己的优势，谁就能获得未来就业的机会。董嘉霖和同桌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一位负责人有了交

流并给该负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卓越表现成国际学生代表

SIFE大赛是董嘉霖在读研期间参加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不仅拓展了视野，也给他带来了荣誉和工作机会。2013年，他第二次参加该大赛，又和队友一起带校队闯进加州前10名，获得了全美比赛资格。

由于董嘉霖的卓越表现，他被学校评为国际学生代表，在拉文大学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代表所有的国际学生发言。

第二次参加SIFE大赛也给董嘉霖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次比赛由美国一家知名的家庭装修产品零售业企业赞助。比赛后，该公司从加州挑选15名学生去该公司工作，董嘉霖成为其中一员。

不过，董嘉霖研究生毕业后，却选择了一家总部在美国的华人企业。他有自己的考虑：“虽然邀请我加入的那家美国知名零售业企业能提供稳定的工作平台，但我希望未来有机会自己创业，因此特别想了解一个公司如何起步、开拓市场等方面的情况，所以我选择了目前就职的公司。”

在董嘉霖看来，国际学生在美国求职确实不易，但他周围一些有实力的同学能够找到工作。“在美国求职，除了实力，人脉十分重要。其实，大学的就业办老师就建议过大家，要多参加一些建立人脉的聚会，从而获得更多的求职信息。所以，从入学起我就注重培养人脉。此外，我在参加一些公司的面试时，公司的招聘主管并未在意我学的是什么专业，而是对我在大学期间的活动经历很感兴趣，希望了解我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学到什么以及我对应聘公司了解多少。”



董嘉霖（右一）和参加SIFE大赛的队友。

际上的高知名度和高认可度，需要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科研水平等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其次，这些大学所在地区的物价较高，拉高了当地的整体消费水平。

生活费方面，作为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伦敦学习的生活费是最贵的。同时，剑桥、布里斯托、巴斯、曼彻斯特、伯明翰、爱丁堡等英国城市的生活费用已经逼近伦敦。

伦敦、伯明翰、曼彻斯特、爱丁堡、格拉斯哥这五大英国城市的生活费虽然较高，却最受中国学生欢迎。此外，从地区来看，英格兰以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宜居的气候、良好的英语环境，成为中国学生最喜爱的地区，是约84.78%的中国学生的选择。

商科专业仍最火

数据：赴英留学的中国学生中，近六成是攻读硕士课程的，其中包括10%攻读硕士预科课程的学生。从2014年的专业申请情况来看，商科依旧最火。

专家点评：大部分英国授课式硕士课程学制仅为1年，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留学时间和留学成本。

2013年商科类专业仍是中国学生留英的首选，其中金融专业最火，占所有留英学生的22.4%。其次是会计、市场营销和管理类专业。申请心理学、哲学、药学这三个专业的中国学生最少，占比分别为0.19%、0.07%和0.015%，主要是由于心理学和哲学的就业较为困难，而药学对申请者的要求较高。

整体看来，在赴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女生占比为58.85%，比男生高出近20%。这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英国硕士课程学制短（本科3年、硕士1年），这对家庭依赖性较强的女生来说，既能增长见识、获得高学历，又不用与家人分开太久；其次是英国相对传统的社会风气和道德观念更适合女生学习、生活。

日前，在北京参加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的英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国务大臣大卫·维莱茨（David Willetts）就中英双方在教育、科技等方面合作的话题，接受了本报采访，并就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非常欢迎中国学生赴英留学”

据大卫·维莱茨介绍，在2014年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上，中英签署了一系列新协议，其中包括旨在未来3年加强中英教育合作的框架协议等。

在此背景下，大卫·维莱茨强调：“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学生赴英留学，英国政府对中国学生赴英留学人数不设任何限制。”

同时，大卫·维莱茨还透露：“我们宣布了一个新的目标：希望到2020年，有8万名英国学生能够来中国学习或实习。就此，我们希望中英两国的企业能够作出更多努力，给学生提供一些机会。”在他看来，这么多的英国学生来中国，除了进行一些传统理工科专业的学习之外，“还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英国学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感兴趣”。

在回应颇受公众关注的双方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时，大卫·维莱茨表示，希望有更多来自中国的中文教师到英国去教书，尤其是到英国的中小学教授中文课程。“此外，希望多开展一些关于中英双方中小学之间教学方法就很有特色，可供英方借鉴和学习。”

“中国班”能否喝到“洋墨水”？

随着中国学生赴英留学人数不断增长，有一个现象颇受关注，那就是英国大学里的“中国班”——某个专业或者某个班上几乎都是中国面孔，甚至有学生家长发出“‘中国班’能否喝到‘洋墨水’”这样的疑问。

大卫·维莱茨就此回应说：“某一个国家来的学生集中到某一所大学、某个专业，这种情况确实有。”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曾和很多英国大学校长就此现象沟通过，“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并在尽力解决”。

“我相信，赴英留学的学生

都希望体验当地大学的文化，而不是在英国体验他们本国大学的文化。因此，一方面我们在努力，使得各国学生的分布更均匀，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不能干预学生的决定。目前，各学校的解决措施是在住宿、研讨会等方面会进行一些安排，以便使各国学生之间以及和英国本土学生之间有更多的交流。”

大卫·维莱茨同时强调，英国的大学由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该机构设定的标准非常高。任何一个学生如果能够从英国大学拿到学位证书，证书的含金量是可以保证的。

2亿英镑中英科研基金方向确定

“牛顿科研基金将瞄准卫生健康、环境科技、食品和水、城镇化、能源、教育和创意产业六个领域。”大卫·维莱茨还向本报记者透露了这一信息。

说到牛顿基金，要回到去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访华，当时中英双方宣布将建立“中英研究与创新合作基金”。“这个基金便是牛顿科研基金，为期5年的基金总额达到2亿英镑，由中英双方各出资一半。”

大卫·维莱茨此次透露的消息表明，联合基金的方向已经确定。关于该基金下一步如何运作，他表示会用于三方面。“第一是用于科研，具体项目要由同行评审决定；第二是促进中英双方的人员交流，可以互派人员学习和共同研究；第三是用于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关于中英之间科学合作的未来，大卫·维莱茨表示将会“持续兴旺”。“4月23日，诺丁汉大学和中国国家遥感中心已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就地球观测和地理空间科学进行合作。此外，英国研究理事会、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等机构正与中方合作伙伴联合设计并开展相关的项目合作。”



图片来源：《春城晚报》

回国感受有形与无形的变化

张悦悦

万八千里。

但这回在国博的纪念品商店里，我发现有好几排在国外颇为流行的考古益智玩具：在巴学大的小盒子里是一块“藏”有缩微兵马俑、恐龙骨架或者古兵器的土坯，和这些缩微宝贝相匹配的是玩具盒子里附带的小刷子等考古工具。小孩子可以根据这些材料模拟真实考古程序，把有故事的宝贝挖掘出来，重新组合，上色保存。这样即便是小学生，也能体会到考古的乐趣。

记得我刚到英国时，发现几乎每个博物馆里除了有针对性展品讲解之外，还会有大量针对展览内容与少儿互动的玩具，有考古的、美术的、建筑的、科学实验的，五花八门。当时我这个博士研究生十分艳羡英国的小孩子从小就能接触这么多模拟实验。确实，严肃的科研勘察和看似深奥的阳春白雪，不应是成年人的“特权”，它们为什么不可以融入童趣的一部分？

就在我惊叹国博的少儿纪念品做得有声有色时，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拉着同伴跑进店里，指着那些考古玩具说：“这个特有意思！”随后两个小女孩叽叽咕咕地热烈讨论着她们下一个科学探险要“发掘”出什么。博物馆的变化是直观有形的，但我更感觉到国内文史科技普及工作的无形变化。

每次回国，我都会发现国内无论是行为做事还是城市基建都有很多变化。有些变化是能看到的，有些变化则需要依靠国内的亲朋向我这个“外乡人”点化才能发现的。比如，容易看到的有形的变化是，转眼间北京的地铁网络完全可以比超伦敦了；而不容易觉察的无形变化是，现在叫出租车都用手机软件了，要是还站在马路上伸脖张望、挥臂拦车可就落伍了。

和每个留学生一样，在国内都市生活各种纷繁的变化中，我对其中“国际化”的元素会尤其敏感，大到发现北京已经引进了从老佛爷到乐购等欧洲各种性质的大商店，小到在居民区的超市里发现了英美流行的脱敏牙膏。

每一次回国的头几天走在路上，我总是免不了发出一连串类似“原来国内也有这个了！北京现在也可以买到那个了！”的感慨。表姐有时揶揄我的一惊一乍好似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但其实每个感慨后面都是小小的惊喜，因为正是这些或大或小的国际元素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扎根才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兼容并包和前沿多元。

你也许不相信，今年4月回北京最让我惊喜的变化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的货架上看到的！在我的印象里，纪念品商店可不是国内博物馆的长项，尤其对于小孩子来说。记得小时候不论是学校组织还是父母带着去博物馆，我踮着脚勉强看到几行严谨枯燥的解说词已经让参观索然无趣，而纪念品店里也无非是香珠、玉器、仿古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真还不如外面小摊上的冰棍诱人！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能上得展堂的历史、考古、书法、绘画“自然”都是给那些学识渊博的大人们看的，与我这个小毛孩隔着十

